

明清江南史叢稿

王家范 著



明清江的史地論

——



明清江南史叢稿

王家范 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江南史丛稿/王家范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108-06070-9

I. ①明… II. ①王… III. ①华东地区—地方史—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5464 号

责任编辑 王婧娅

封面设计 储平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3.25

字 数 333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 以平常的心走自己的路（代序）

挣脱计划经济的束缚，汇入世界性的市场经济大潮，这对具有世界罕能相比的中古传统的中国，无疑是一掀天揭地的大事件。它不仅在经济领域撞击出一连串的裂变反应，而且使积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经历着剧烈的震荡。整个社会在剧烈的震荡中变迁，使人眼花缭乱，又处处牵动人的神经。社会的行动，现实的变迁，总比我们设想的更少理性。在激动、混乱的嘈杂之中，往往充满着野性。身处这一历史变局中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会显得特别的不平静。尤其是人文科学知识分子，也许是出于“职业特点”，他们更追求和谐、理性与完美。因此，当他们面对现实的社会变迁时，往往变得躁动不安。一些人文学者，因追求和谐、理性与完美而呼唤改造社会和国民，渴求振兴中华的变革，但当变革切切实实在身边展开，变得可以捉摸、可以体验时，面对五色缤纷、光怪陆离的新旧嬗变，他们又觉得有太多的始料不及，不尽如人意。于是就有了迷惘、沮丧、困惑和失落。说起来，真是让人难堪，叫人莫解，不可思议。最近，有好几位学者，以深沉且带有些许悲怆的口气，发表他们对现实变化的种种意见，其间，还不时流露出几分孤傲和轻狂。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面对社会的震荡与变迁，人文科学知识分子，是否应具有坚定的理性，多几分平静和冷峻，少一些浮躁和盲动？既然人文科学是关于社会组织 and 人的行为怎样符合理性的学问，是关于如何养成一种良好的社会人文心态的学问，那么，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且有两个基本方面是丝毫不能忽视的。

## 知识分子要历史地、理性地理解变革

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在设计并贡献各种回应变革的对策时,最好能温习一遍古今中外已有的历次变革,以期对社会变革能有一种知识界特有的冷峻,以坚定的理性对待变革。有感于人生的诸多烦恼,有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人生就是一场经历。其实,由个人群聚而结成的社会又何尝不是一种经历?人类又何尝不是一直在为解不清的“社会情结”而苦恼、而调整、而变革?诸多的社会两难命题,如群体与个人的矛盾对立、物质享受与精神需求的矛盾对立、自由和秩序的矛盾对立、集权和分权的矛盾对立,以及人自身的本能与意识的矛盾对立、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对立,一直在考验着人类的心智。“上帝”给我们的,是一架永远找寻不到平衡、处于摆复中的“天平”。种种的阴阳两极相运,过分倾斜到哪一头而舍弃另一端,社会都难得安宁,人们也不会感到满足。就以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社会变革而言,又何尝不是对传统的、中世纪的种种“不合理”的倾斜和压抑,做一种尝试性的调整呢?已有的历史经验足可以证明,社会的变迁,如文明取代野蛮、封建制代替奴隶制,都是得失相兼、利弊俱生、善恶共荣共存的。市场经济变革除了带来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物质的富足),也必将混杂着污泥浊水,叫人们一口吞下,不消受也得消受。早在20世纪初叶,陈寅恪先生游学日、法、德、美之后,凝聚其精要的体验思索,发表了一席至今读来仍震烁人心的宏观高见。他一方面预言“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营商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另一方面又深致忧虑,谓“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且曰:“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这是谁都得经历的、无可逃遁的变革的历史代价。明乎此,眼前的诸多不尽如人意都显得淡淡的,一切均在必然中。梁启超说过,近代中国是一个

过渡时代，他自己是一个过渡的人，“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叶扁舟，初离海岸线，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现今之中国，情境虽不同于近代之中国，但仍是一个“过渡时期”，迷惘与困惑自也难免。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患得患失、顾影自怜，何不以一种平静明智的态度，去观察那些为众人不满意的不合理的旧事物是如何随潮流而去，而新的不满意、不合理又是如何产生和生长的呢？变革，将是无穷无尽的，如危崖转石不达平地而不止。新旧交替，众人不满意的不合理的事物，终究会被无情地割舍。变革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只处于航程的头一段，即通常所说的“初级阶段”。因此，不必苛求变革，也不必苛求自己，一代人做不到的事，后一代人一定会去做。

### 知识分子应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

变革是全社会的事业。作为人文科学知识分子，首先就应该抛弃那种唯我独尊、唯我独醒的“替天行道”的英雄气或霸气，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传统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根本不同于此前所有的社会变革。它首先是世俗化，大众广泛参与的程度前所未有；其次是由单一的机械整合转向高度分化的有机整合，即社会趋向多极化、多元化。反观已有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和经验，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都程度不同、形式不一地朝着愈益世俗化和高度分化的方向转轨，旧秩序和传统无不先后崩坏，而新秩序的确立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现代社会变革犹如一台大戏，生、旦、净、丑各角均不可缺，编导、美工、乐师、内勤俱有建树。摧毁传统秩序，营建现代社会，政界、商界、文化学术界的彦硕名流固然占尽风流，但贩夫走卒、芸芸众生，自亦有他们的一份血汗、一份贡献。譬如近十几年崛起的民间坐商行贾，人们固然有理由瞧不起他们，刻薄他们的贪婪、卑劣和庸俗。然而，在经济的变革中，由他们演奏出的不协调的“流行曲”历史不会不记载，不会不给予公正的评价。对他们，与其刻薄之，倒不如多一点理解，仔细地去体察一下他们在市

场经济大潮中搏击时内心的苦涩、烦恼和时时流露出来的那种莫名与无奈。说到底，这是一个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人不论是伟人名流，还是凡夫俗子，归根到底都是断不了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肉体与灵魂合一的“人”。在现代社会，我们理应更尊重每个人对生存的选择和争取生存权利的努力，少一点贵族式的文化偏见。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传统久远的中国古代社会，读书人因为占尽了物质和权力分配的优势，很少分化和另谋他业。时至今日，这种分配上的中世纪优势已是明日黄花，“良辰美景”再难追回。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知识分子面临着高度分化的命运，需要做出各种选择。近十几年来，知识分子先是经历了从政风——许多人满怀信心，以为知识分子从政一定能别开生面，而后来不知为什么对从政又颇多非议与指摘。其后是迎着商品经济大潮的从商下海风——这至今仍拨动人心，只是蔑视、调侃以致公开斥责的议论逐渐多起来了。其实，议论和斥责，皆大可不必。人各有志，人尽其才。知识分子从政经商，为这些领域增添新鲜血液，提高文化素质，贡献智商、谋略，不都是营建多样化的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吗？物竞天择，大浪淘沙。相当一部分人也许成不了大事，做不成善举，会被淘汰或淹死，却也不足以成为杞人忧天的理由。成功者毕竟会有有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逐渐变得更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从长远看，知识分子的这种分化，正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中世纪的显著特征之一。

作为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假如你是甘心选择这一清苦的事业的，那就应该既来之则安之，潜心于学，无事喧哗，不计毁誉，安贫而乐道。“吾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陈寅恪语）前辈大师既已讲得如此明白，新后进学似亦不可再作他图了。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不求闻达，自甘清苦，亦是一功。总而言之，自己走自己的路，也不必菲薄他人。

泛指的人文科学可以包含社会科学，但严格而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



学,是应该加以区分的。研究人文的学者,往往超脱具体的功利和时空,将“天理人性”看作“有一无二,有同无异”的具有永恒意义的追求。尽管他们的信仰和体验都具有个体性和时代性,但他们内心所服膺的,则是超时空的真、善、美最高境界。相比之下,社会科学学者则更多地关注当下社会发展的难题和操作路线,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可行不可行,有利与无利,往往是他们最煞费苦心思索的。他们比人文学者较少浪漫色彩,奉行现实主义。然而,现在有些人文学者,视社会科学注重应用与操作为雕虫小技、急功近利,这就是大谬不然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往往交互为用,各具千秋。但与传统社会所不同的是,目的-工具理性成为社会的主潮流。讲求效率和效益,能使现代化社会比传统社会产生高得多的生产力和多得多的物质财富。利益机制就是比道德机制具有更大的能量和约束力。这一点,我们正在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无可奈何地被迫承认,这是现代化社会运行难以抗拒的一条法则。现代中国,更缺的,或者说更迫切需求的,就是关于社会变革的全面发展的操作设计和实践对策。基于义理又合乎国情的、有真见卓识的社会设计与对策,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真正愿意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实际,敢于碰我们不熟悉的社会问题,敢于贡献思虑甚深的实践方案的学者也太少,很不够用。这样说,丝毫没有菲薄甘心从事纯学理、纯人文研究的学者的意思。例如提倡新儒学、新国学的学者,不囿功利,不求闻达,不苟合于时潮,就像陈寅恪、吴宓那样,“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救人心,挽世道”,是很值得全社会敬重的。人文科学知识分子要敢于直面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与有机整合的现实要求,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如泰山不让土壤而能成其大,如河海不择细流而能就其深,特立独行,不废古今,由此而涵养的文化精神必将惠及当代与后世。

(原载《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9期)

# 目 录

001 以平常的心走自己的路(代序)

## 专论

003 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

025 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

046 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

063 明清苏州城市经济功能研讨

——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

080 从苏州到上海:区域整体研究的视界

## 散论

- 089 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命运
- 107 晚明人眼中的晚明世相
- 114 重评明末“封建与郡县之辨”
- 129 顾炎武的第三种眼光  
——甲申三百七十年再祭
- 135 如何读懂顾炎武？
- 142 昆山三徐：康熙朝乡绅的一个侧面
- 151 动乱以别样的方式降临小镇  
——读《庚申年陈墓镇纪略》
- 158 富贵在天，平安可求
- 161 最后的乡绅

## 讲谈

- 167 发展与忧患：明清史再认识
- 176 “总体史”与社会变迁理路的整合  
——明清史研究走向臆测
- 182 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  
——从“黄宗羲定律”说开去
- 197 明清江南的“市镇化”
- 205 我们了解农民吗？
- 215 寻找历史通感
- 227 地方志的价值论
- 230 地方史志有“脑补”功能

- 234 陈墓二朱  
——“新文化运动纪念”门外谈
- 243 从知县形象看明清基层政治生态
- 255 山水自然,开发有道
- 263 社会风气与天下兴亡
- 270 徐光启个人价值取向研究建言

## 序跋

- 277 疏通知远:中国经济史通识的获取  
——《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序
- 288 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  
——《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序
- 299 感受与体验万年史的心境  
——《大学中国史》原序
- 327 《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序
- 331 明清地方官的“猫鼠游戏”  
——《明清歇家研究》序
- 338 《近代江南农村经济变迁》跋
- 343 附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存稿





# 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

早在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江南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市镇经济的活跃,受到经济史家的注目,被认为是该地区的经济特色。但是,当深入到准确定位它的历史价值,特别是它在传统向现代过渡(史学界习称“资本主义萌芽”)方面所具有的基本性质时,经济史家在各自的论述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分歧。笔者认为,这里既有许多理论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同时,也需要对明清江南市镇做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以期弄清历史原貌,为进一步讨论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本文打算以明代为重点,兼及清代,从探索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的市镇结构着手,就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以供讨论。

## 市镇的勃兴及其分布密度

关于我国民族市场的形成,学术界至今还未有定论,本文不拟涉及。但据接触到的资料,至迟到明代,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是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其时,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屡屡五府乃至七府连称。<sup>①</sup> 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

---

<sup>①</sup> 洪武三年六月上谕即以“苏松杭嘉湖五郡”连称(《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成化九年为统筹该地区的农田水利,明王朝还添设了“苏松常嘉湖五府劝农通判”(《吴兴丛书》,载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将“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连称,在公私著述中也屡见不鲜。如王鸿绪《明史稿》卷六〇《食货志·赋役》引大学士顾鼎臣言,张袞《江阴县志》(嘉靖十七年刊本)卷二《提封记》引明弘治十三年刘震《行台记》,都把以上七府看作经济整体。恕不再一一赘列。

洲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形成。这个经济区当时以苏、杭为中心城市(苏州是中心的中心,到近代才为上海所取代),形成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具备了区域经济基本的内在结构。其中深入河网、密如星斗的市镇,担负着沟通城乡经济的职能,是与市场结构多样化相适应的经济网络的基础。如果没有市镇与都会、府县治、其他市镇,以至全国各地市场之间的多种联系,就不能认为江南经济区的存在是合乎事实的。由此,我认为,市镇对区域经济的形成具有关键的作用。

“镇市”作为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新名词,正式出现于北宋的熙宁、元祐年间,到南宋以后常见于官方文书以及地方志中,成了一个专门用语。<sup>①</sup>江南市镇的渊源同样可以追溯到唐宋以前。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一般可以从两种角度去观察:一是纵向的,即经济实际水平的提高;一是横向的,即同一经济水平作面的推广,向落后地区或乡村扩展。由战国、秦汉的“都市”,经东晋隋唐的“草市”,发展到宋明的“镇市”,正是我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几个界标。<sup>②</sup>从“都市”发展到“镇市”的过程,既典型地反映了商品经济先是集中于城市,而后向乡村伸展的横向进步;同时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逐步克服前期的病态,把自己的基础建筑在农副业经济的发展之上,也包含着纵向的进步。因此具有双重意义的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引起经济史家的极大兴趣也是很自然的。

通观江南市镇的发展,明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以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而论,与唐宋相比较,明代该地区市镇确实可称“勃兴”。除了该区域的东部

① 目前看到较早的官方文件是熙宁七年四月诏书:“城外草市及镇内保甲,不得附入乡村都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七)元祐元年四月诏书中亦有“坊廓、草市、镇市”的提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六)。到南宋,在《景定建康志》《宝庆四明志》《绍定澠水志》《咸淳临安志》以及《梦梁录》“两赤县”条中,均有“镇市”专目。到明代则普遍见于方志。

② “市”的起源极早。所谓“神农作市”(《竹书纪年》)、“日中为市”(《易经·系辞下》),反映了集市在文明时代的序幕阶段即已产生。但直到东晋、隋唐以前,法定的市制则多限于国都以及郡县的治所,故常“国市”(《左传·昭公十三年》)、“都市”(《汉书·食货志》)连称。据目前所知,“草市”始见于东晋。“镇”自汉以来,多是军事戍所,唐末五代更有发展,置镇将。“镇”正式与“市”相连,则起自宋。但宋初尚保存了不少军事意义的“镇”,以后逐渐淘汰,到南宋“镇”“市”才一致起来。



沿海地区,特别是苏松接近上海的沿海地区以外,近代市镇的基本规模和分布格局,可以说是在明代奠定的。清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乡村集市的数量明显增加,以及明代的某些市上升为镇。现以具有代表性的湖州府与苏州府为例,列表说明于下。

湖州府宋明清市镇增长情况表

时间 县名	北宋元丰年间①		明万历年间②		清乾隆年间③	
	镇	市	镇	市	镇	市
乌程县	1		2	2	4	2
归安县	1		5		4	1
长兴县	2		5		5	0
武康县	0		2		0	0
德清县	1		2		2	0
安吉县	1		3		3	0
孝丰县			1		1	0

由上表可以看出,湖州府的市镇,宋明间有较大发展,其格局到明万历年间已正式形成,清代无显著发展。其中宋明两代,“市”的缺载,并不表明村落的“草市”“集市”不存在,而是明代以后,人们观念中的“市”,已是日日贸易,但格局简陋,往称之为“小集镇”,所以有些方志对“镇”“市”的界定不是那么稳定(直至民国以前,“镇”始终不是正式的行政名称,仅是约定俗成的)。这只要看苏州府的情况就明白了。见下表:

① 据《元丰九域志》卷五。另据嘉泰《吴兴志》(载《吴兴丛书》卷一〇《谈钥所言》),北宋初年,湖州府管镇由元代的二十四所降为十六所,八所已废。到熙宁、元丰年间则又由十六降为六。于此可见,具有经济意义的市镇到宋代尚在逐渐形成过程中。到明代湖州府市镇才基本上完成了由军事意义到经济意义的转变,进入一个新阶段。

②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

③ 乾隆《湖州府志》卷一五。